



圖一 明成化 鬥彩雞缸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創於成化時期的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種色彩相結合的鬥彩工藝，開創了我國彩瓷的新時代。」（註四）「一般以鬥彩為成化窯的絕唱。」（同註一）以上所引著論，旨在說明成化鬥彩之盛況。

當時畫工地位低賤，尤其在官窯之中，畫工任憑執事擺佈。在御窯工中有兩種，一是上班工，二是招募工（相當如今的在編工與臨時工）。在畫作中，分工很細。謂「畫者則畫而不染，染者則染而不畫，所以，一其手而不分其心也。其餘拱錐雕鏤業似同，而各習一家。釉紅寶燒，技實異而類近於畫，至如器上之邊線青箍，原出鍛坯之手。底心之識銘書記，獨歸落款之工。花鳥蟲魚寫生，以肖物為上。」（註五）通常畫工中分四類，首類人物、次類狗馬，再次類山水、再此類花卉、最後是圖案。但在宮中卻依喜好者而論。時有畫工，崔姓，為人清高，有學識，善人物，技藝精湛，所畫人物生動有神，為群工之首。但萬貴妃卻只賞花卉，不賞人物。所以，在雞缸杯（圖一）、葡

## 崔公窯與八仙杯的故事

院藏明成化鬥彩雞缸杯與嘉靖五彩八仙慶壽茶盅之間，在中國陶瓷史上其實流傳著許多傳說，本文為您介紹其中一段關於崔公如何紹承其父技藝並發揚光大，在明代嘉隆間民窯燒瓷中獨出一幟的故事。

在《中國的陶瓷》一書中謂：

「崔公，名國懋，嘉隆間人，郭葆昌把他作為成化弘治間人，不確。如為成化間人，則『多仿宣成窯遺法制器』（《陶錄》說）。（註一）。由來制陶皆為世傳，崔公也不例外。故郭葆昌的話並非空穴來風，這裏隱藏著一段悲慘的冤情……」

「成化六年，萬貴妃專寵，宮

中莫敢言。」（註二）萬貴妃專權，

飛揚跋扈。時有宦官梁芳「諂萬貴妃，日進美珍寶悅妃意。」（同註二）當時梁芳見萬貴妃喜愛飲酒，便投其所好，為諂萬貴妃，派手下宦官，專駐景德鎮督造御瓷。這裏所說的「美珍寶」，其中就有鬥彩「雞缸杯、葡萄杯」。《明史·食貨志》載：「成化間，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鎮，燒造

御用瓷器，最多且久，費不貲。」

（同註二）「景德鎮在明代為中國的瓷都，……朝廷在當地設立御器廠，承擔了為宮廷、皇室提供最優質的瓷器任務，……便不惜代價，向高、精度發展……擴大新品種，提高產品質量，從而也帶動了民窯的進一步發展。」（註三）「以成化鬥彩為代表的彩瓷，是我國陶瓷史上空前的傑作。」



許鶴巖



圖三 明成化 鬥彩高士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明成化 鬥彩葡萄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葡萄杯（圖二）、娃娃杯、高士杯（圖三）、秋千杯、龍舟杯、高燒銀燭照紅妝杯等諸杯中，人物杯多為崔工所繪，卻未能被萬貴妃賞識。

舊有一說萬貴妃唯獨賞其雞缸杯與葡萄杯。為抬二杯身價，獨領群杯之首，暴虐的萬貴妃，便令其督窯宦官毀窯、毀礦。而此暴虐事件的藉口卻由後一事端所引出。

崔工，富文采，畫工技藝精湛，為人清高。卻獨有一好，凡經他手中畫出的瓷坯，定設法留一件作為私藏，此在當時御窯中是絕對犯法之事。「高士杯」燒制後，有嫉賢妒能者向督窯宦官告發，的確在崔家抄出高士杯、娃娃杯、八仙杯等，崔工即以私藏御器之重罪被誅。時崔工有一子，名國懋，年僅二十有四，同在御窯畫作中為染工，事發之前，友人密告，其子知事態嚴重，便攜其父所有畫稿逃逸深山。遠望其父遭誅而無力回天，只有遠遁他鄉，隱姓埋名待機而行。此後，便引出毀窯、毀礦的重大事件。「其時有一個武官叫應時用，看到朝廷委派的內臣（太監）到

窯」燒制。此為民窯之興，創造了條件，也為崔國懋的建窯創造了條件。這就是「郭葆昌把他作為成化、弘治間人」的原因所在。

時孝宗已大赦天下，崔國懋亦無懼舊罪。鑒於身有所長，靠舊友提攜，重操舊業，自建窯，取名崔窯，但資力單薄，釉料奇缺，只能燒造民器，節衣縮食，韜光養晦，待機振興，以滿父願，燒造其父所有遺稿，公諸民間。

正德年，武宗即位（一五〇六），「正德僅十六年，其帝既無能又荒謬，朝政落入太監之手」（同註三）「正德初，又置御器廠，夏用中官專管御器。十六年（一五二一）以梁太監督陶。」（同註七）「正德時期國內比較混亂，江西連續七、八年之久的暴動波及到景德鎮。」（同註二）此時崔窯雖已復興，但資力有限，國懋歷經刀光，閱遍三朝，仍待時機，未敢復出。

「嘉靖以後，排斥宦官之風大盛，景德鎮督陶官改用地方官，御器廠規模日益龐大，建制也日益完備起

景德鎮督燒瓷器，貪贓枉法，殘害百姓，曾上書朝廷請求改由當地官吏辦理此事，因此而得罪。」（同註三）

御窯及御礦被毀，自此優質的坯料、釉料礦源斷絕，名噪一時的姹紫一色在瓷器之中再無得見。御窯停燒，雞缸杯與葡萄杯，身價倍增，已滿萬妃之意。「明沈德符《萬曆野獲編》說：『成窯酒杯，每對至博銀百金。』而鬥彩雞缸杯則更為貴重，明《神宗實錄》載：『神宗（萬曆帝）時尚食，御前有成化鬥彩雞缸杯一雙，值錢十萬。』」（註六）

「成化二十二年（一四八六），又裁饒州燒造官。『此憲宗末年，孝宗初政，故終孝宗十八年不言窯事。』（《浮梁縣誌》）」（註七）此說因由在萬妃的毀窯、毀礦事件，致使弘治十八年御窯不燒。御窯時止，民窯遂興。

「成化之後即位弘治，孝宗是一位較有作為的皇帝，被人稱為『中興之令主』」（註八）。孝宗即位，大赦天下，雖不滿萬妃之所為，但窯、礦已壞，所有宮廷御器，則取「官搭民

來，但由於景德鎮製瓷原料『麻倉土』將次告竭，瓷質不及以前；『鮮紅土』也絕，因未掌握新原料特性，產品變形情況增多，器型內在質量也不如前。……但青花、五彩甚為發達。青花料因選料極精，加之正德間從雲南獲得了回青，此時使用到青花瓷胎上，呈色濃郁，幽茜而美。五彩漸趨複雜，內外夾花、錦地、兩面彩等裝飾圖案逐漸走向繁縟的道路。素三彩、黃地綠彩及紫彩都有很好的作品。」（同註一）

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後年號嘉靖，在朝四十五年。其帝為求長壽，篤信道教，並習黃老之術，迷戀於采陰煉丹。有事例便知一二：

在道教齋醮儀式中用朱筆寫在青藤紙上獻給天神的奏章祝文，嘉靖帝欣賞。

上聯為「洛水玄龜出獻瑞，陽數九，陰數九，九九八十一數，數通於道。道合元始天尊，一試有感。」下聯為「岐山丹鳳兩呈祥，雄鳴六，雌鳴六，六六三十六聲，聲聞於天。天生嘉靖皇帝，萬壽無



圖四 嘉靖 五彩八仙慶壽茶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至今。今得此杯，公諸於世，諸公賞之、解之，順便也說明郭葆昌把崔國懋「作為成化弘治間人」的原因。或許能得更詳盡考證。至於諸公謂「崔

國懋，嘉隆間人」，亦無矛盾，崔公住嘉靖，崔公窯則可延至隆慶。「郭葆昌把他作為成化、弘治間人」，並沒有說崔公窯是成化、弘治間窯。

疆。」的祝文。

對於繪畫，則欣賞「萬福圖」、「萬壽圖」的東西。如《無錫縣誌》、《常州縣誌》記載了嘉靖朝的畫家張廣：「嘉靖中征入京，待詔內廷。世宗見《萬福圖》賞之，命畫進所畫。於是宦者共屬廣為《萬壽圖》，將獻之以邀寵。」（註九）

由此可見，嘉靖帝好道的目的以求長壽，喜美言嘉語恭維之。此時，崔國懋已年近花甲。日月如梭，光陰飛馳，督陶官一個個走馬，皇帝一代代更替。他崔國懋已改其父之清高，歷練成一個看風使舵的世俗行家了，他看透了當朝皇帝的喜好，也摸准了御窯方向，正所謂「以御窯所造，看宮廷所好」。如當時嘉靖御窯燒制了《嘉靖青花仙人壽字罐》、《嘉靖青花仙人渡海圖雙耳瓶》、《嘉靖青花雲鶴八仙葫蘆瓶》等。他覺得時機已到，等候三十多年了，終於等到了滿父夙願的一天。當時御窯仿宣、成，他也仿宣、成。但他的仿品比御窯的仿品要精美的多。如「《野獲編》稱

『嘉靖窯（御）則又仿宣、成二種而稍遜之，惟崔公窯嘉貴』」其原因就是當年其父為宣、成御窯所繪畫稿全在他的手中珍藏，以原稿所仿安有不佳之理？這也正是嘉靖「官搭民窯」之策，搭在崔公窯上燒出《嘉靖青花八仙祝壽罐》、《嘉靖青花嬰戲圖盤》、《嘉靖青花人物圖杯》、《嘉靖青花高土杯》等。《景德鎮陶錄》載：「崔公窯，嘉、隆間人，善制陶，多仿宣、成遺法制器，當時以為勝，號其器曰崔公窯瓷，四方爭售。諸器中惟盞式較宣、成兩窯差大，精好則一，餘青彩花色悉同，為民窯之冠。」（註十）可見崔公窯當時之盛名。至於「較宣、成兩窯差大」即說在釉料上無官料的考究。「精好則一」說的是畫工精好如一。其原因又是落在畫稿上了。

到後來，他索性將珍藏多年而從不問世的《八仙杯》原稿請出，燒制一對鬥彩杯。應嘉靖帝好道而求長壽之願，在八仙之前加繪一乘鶴壽星，更名曰《乘鶴壽星八仙獻壽杯》。平青釉色，線條清秀飄逸，鐵線兼遊絲

描，形態生動，面目傳神，其畫工技藝至達頂峰，體現出當年崔公之父在成化御窯之高峰。用色有紅、綠、桔黃、粉紅、黃、淡黃、淡紫七種之多。碗底繪一盤龍，未取成化象鼻唇龍，而取嘉靖單線勾畫五爪龍。底足內有「大明成化年制」六字雙行雙線圓款，字體清秀，端莊有力，體現出在歷代瓷器款式中少見的灑脫、俊拔之氣。

可見崔公為滿父願，其用心已達極致。凡通繪事者，見之無不驚歎。嘉靖帝得見甚喜，只惜釉色略遜官料之精豔，遂命御窯用官料仿製，將乘鶴壽星繪至碗底以代蟠龍，並將底足內款更為「大明嘉靖年制」六字雙行雙線圓款。其釉色白淨，五彩妍麗，張顯出御窯精美，雖畫工筆力不及崔公窯灑脫、飄逸，但釉料卻勝崔窯一籌。故有「回青釉色，刻意淡描，青花色淡雅……名為《五彩八仙慶壽茶盅》，嘉靖官窯類青花或鬥彩類器，刻意仿造成化製品」之說。（圖四）

由上述可知，《八仙杯》成化間已經燒制，只是由於前述事件未傳

而且更能說明「多仿宣、成窯遺法制器」之緣由。

作者任職於新疆藝術學院

## 註釋

1. 輕工業部陶瓷工業科學研究所編者，《中國的陶瓷》，輕工業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，頁二〇六—二〇七、二一〇。
2. （清）張廷玉等撰，《明史》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四年四月，頁一八三、七八一、一九九九。
3. 馮先銘主編，《中國陶瓷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十二月，頁四六七、五〇一—五〇三、五一四。
4. 陳雨前、鄭乃章、李興華著，《景德鎮陶瓷文化概論》，江西高校出版社，二〇〇四年十月，頁一四九。
5. 熊夢、熊微編註，《中國陶瓷古籍集成——藍浦《景德鎮陶錄》》，上海文化出版社，二〇〇六年八月，頁四七五。
6. 吳戰壘著，《圖說中國陶瓷史》，百花文藝出版社，二〇〇九年，頁二〇〇。
7. 江西省輕工業廳陶瓷研究所編，《景德鎮陶瓷史稿》，三聯書店，一九五九年八月，頁九七—九八。
8. 《明通鑒》，卷四〇。
9. 孔六慶著，《中國陶瓷繪畫藝術史》，東南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三年十二月，頁一五六。
10. 劉如冰著，《宋元明清瓷器鑒賞》，二〇〇五年。